

CHINESE SEMIOTICS

中国符号学丛书

社会符号学

- 名誉主编 汤一介 / 主编 龚鹏程
- 林信华 著 /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符号学丛书

社会符号学

- 名誉主编 汤一介 / 主编 龚鹏程
- 林信华 著 /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符号学/林信华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1.5

ISBN 978-7-5473-0310-8

I. ①社… II. ①林… III. ①符号学—应用—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8305 号

社会符号学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17.25

插 页: 4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310-8

定 价: 34.00 元

总 序

龚鹏程

老虎和猴子的世界里，没有钞票、皇冠跟文字，只有人的生活里才有。人对它们的追求，显然大于生肉或香蕉。而皇冠，其实不过是铁丝编缀成的一个符号；钞票也只是一张纸；文字呢，更是一堆符号系统罢了。可是它们就代表了财富、权力和知识。人类的所有活动，几乎都围绕着这类符号打转，为了它，寻死觅活。

这是人类社会的特征。猴子就不，它们对香蕉的兴趣，一向高于皇冠。所以说人是生活在符号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比符号与人的生活联系得更密切的了。

符号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符号的学问。

虽然人类使用符号已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但一般所说的符号学，却是诞生于 20 世纪初的新学科。其意义和价值在于：一、人的一切思维、语言和交际既然都离不开符号，对符号的研究必可加深我们对世界、思维乃至人自身的认识；二、符号学不但在当今学界有重要位置，且相关领域十分广泛，可见该学科具有巨大潜力；三、目前符号学已是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方法，影响到一切社会人文学科。因此，对符号学的深入研究也必然会促进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现代符号学思想有两个源头，一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二是美国逻辑学家皮尔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法国，之后迅速扩及美国和苏联等国。目前符号学研究已成国际性的热潮，且已成为跨学科、跨领域的方法。正如英国哲学家比尔兹利所说：“符号学无疑是当代

哲学及其他许多思想领域最核心理论之一。”

我国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符号学研究专业性刊物，国际知名符号学家也寥若晨星。虽然如此，我们在符号学研究方面也并非毫无成绩可言。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们陆续翻译了不少国外专著，为我国学者借鉴国外符号学思想提供了许多便利。其后，我国学者的专著亦渐增多，符号学研究渐渐蔚为风气。台湾于1997年成立了“中国符号学会”，策划多届研讨会，并与大陆交流。大陆则于1994年在苏州大学召开了首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1996年在山东大学、1998年在西南师范大学、2000年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2002年在南京师范大学、2004年在中国海洋大学分别召开了第二、三、四、五、六届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这标志着符号学研究已步入正轨，学术社群已然成形。除了一般符号和语言符号学外，叙述符号学、社会符号学、电影符号学、话语符号学、主体符号学、艺术符号学等各部门符号学研究，也同时展开了，各有不错的表现。此外，符号学也向各个学科渗透。作为一门方法和研究视角，在语言学、哲学、文学、文化、艺术、传播学、民俗学、都市规划等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对非语言符号的地位、功能也开始予以关注，如对服饰、身体语言符号的交际功能研究等。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我觉得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典籍中符号学思想的考掘，或用符号学方法去阐释中国的历史文化现象。台湾的“中国符号学会”即以此为方向。

我自己是台湾中国符号学学会创会会长，曾出版《文化符号学》，并担任过世界中国哲学会副会长，办过南华、佛光两所大学，对学界生态及符号学本身都还算熟悉，深知符号学是魅力无穷的学科，发展空间极大。但中国人若只跟着西方做研究，其实就只是当学生，弄不出什么名堂。如想真有创获，且能与西方对话，只能是上述这个中国文化符号学的方向。

2003年汤一介先生主办北京大学蔡元培学术讲座，邀我就符号学申讲，会后结集编成《文化符号学导论》，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汤先生为我写的序文，认为中国的《易经》本来就是观象系辞的，由易象、河图、洛书，乃至道教的图、符、策等等符号，进行一个相关系统的研究，完全可以创建一套中国符号学。他甚至还建议把我那本小书改名为“中国文化符号

学导论”。

我自己明白我的书达不到他的期望，但依目前符号学在学界发展的态势及受关注的程度，策划出版一套“中国符号学丛书”恐怕很有必要。汤先生对诠释学、符号学之中国化，本来就着力甚深。他既鼓励我做，我自然义不容辞；乃在东方出版中心支持之下，召集诸同道，就符号学的几大领域，各撰写了一册。

以上各书，均以中国历史、文化、社会为题材及讨论内容，吸收西学，而又有别于西方符号学论述，尝试建立中国符号学体系。作者则包括了海峡两岸的知名学者。椎轮大辘，未必遽能符合预期，但起码显示了一种尝试开拓的雄心，相信也能鼓舞更多符号学的爱好者共同来耕耘。

自序

中国社会及其所使用的语言符号系统在世界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特别是在今天的全球化社会中，更是如此。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在学习汉语，他们也许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外语在学习，或者希望到华人社会读书和工作，也可能想要了解华人社会文化的特性。过去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感觉到欧洲人是想要了解中国的欲望和热情的。也许传统的中国对于他们来说具有神秘的色彩，而今天的中国则是全球化社会当中必须接触的地域。汉字系统是一个复杂的语系，但一旦学习掌握得很好，通常会让人惊讶与赞叹。西方人是通过拼音化的方式来学习汉字，他们以此来接触中国文明和社会，有的人掌握得还相当精准。

就传统的中国社会而言，它的生活形态不同于西方社会，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对此都有论述。理解这个差异是一个观察与研究的方向，特别是在今天越来越同质化的全球信息社会中。这个差异的重点可以有很多，可以从政治、历史、经济、社会等角度来观察。其实，这里不存在哪一个角度更优秀或适当的问题，而是要通过各种角度的整合来表述这个差异。在社会科学的立场中，这个表述也只是一个不断接近实在的过程而已。除了这些角度之外，我个人比较有兴趣的是语言和文字符号系统，它与社会文化生活的联系也可以体现东、西方社会的差异。这个差异，不只表现传统东、西方社会的不同生活风格，同时也是表述今天东、西方社会逐渐同质化的理由之一，它就是符号系统的网络化和标准化。

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从符号系统的角度来理解东、西方社会的差异，说明一个社会的生活形态和文化特性上的独到之处，会呈现出一种别样的

社会符号学

学术景观。但这个工作并不容易，它需要更多的历史资料，以及对这些资料的详细分析。换句话说，这项工作，需要长期与有计划的研究。对于这些资料的收集，中国大陆有相当丰富且富有启发性的成果，他们的研究可以说是相当优秀。本书并不是在这个面向上铺陈，但可以说是一个准备的工作，初步揭示中国社会与文化秩序。它会在观察角度的敏锐性、符合全球学术的潮流，以及未来对资料的分析方向上，给读者有所启发。所以阅读起来，它可能比较像一本理论性的著作，也许有很多地方是点到为止的感觉。但它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在今天全球中的处境，应该会有比较深入的印象。它所应用的西方符号学与文化理论并不是理论本身的单纯思辨，而是同时体现东、西方社会的特性与差异。

林信华 2011年2月于台湾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秩序的符号系统	1
第二节 作为活动的语言符号	9
第三节 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符号意义	18
第二章 理解社会与文化秩序的西方传统：符号学	32
第一节 符号的主题	33
第二节 作为文化科学的符号学	35
第三节 符号学与其他社会科学	46
第三章 西方拼音符号系统与中国象形符号系统的 文化	52
第一节 作为符号学研究对象的书写符号	55
第二节 符号意义的现象学基础	65
第三节 拼音与象形符号系统体现的社会文化 特性	76
第四章 时间性与知识系统在中国社会中的文字化	82
第一节 体现在中国文字符号系统的时间性	83
第二节 社会时间的文字化	89
第三节 中国知识系统与文字符号的社会关联	95

第五章 符号系统与社会文化生活的联系及发展	101
第一节 承载社会沟通的符号系统	101
第二节 符号系统作为社会沟通的深层心理结构	118
第三节 中国符号系统在全球化中的发展	136
第六章 符号与社会文化生活的联系和发展——以 “英雄”这个符号为例	144
第一节 “英雄”作为一个符号的社会意义	146
第二节 符号意义在社会变迁中的转变	150
第三节 “英雄”在当代社会中的符号意义	165
第七章 文字符号在东西方宗教中的关联和发展	172
第一节 文字符号的社会功能	172
第二节 符号在宗教研究取向中的关联	176
第三节 东西方宗教符号体现的现代化	184
第八章 中国艺术生活中的符号意义与功能	193
第一节 象征符号系统的美学特性	193
第二节 符号作为美学行动与直观符号	199
第三节 西方结构形式与中国图像自然的美学 符号	210
第九章 东、西方在全球信息社会中的符号沟通与 发展	214
第一节 社会秩序的科技基础与符号结构	215
第二节 日常沟通的符号系统与国家生活的发展	221
第三节 中国符号系统的全球化与地方化	229
参考文献	241
附录	258
中外人名对照	258
索引	261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秩序的符号系统

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秩序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与学科来进行,例如人类学、社会学或文化理论等等。这些学科所共同面对的是正在运作的社会与文化秩序,它们对这个秩序如何运作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但一个共同与根本的事实是,这个秩序通过语言或广义的符号系统正在运转着。^① 不论是中国还是德国,社会和文化秩序都通过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表现,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都在使用与理解。当然,现在这个语言符号系统有着全球的同构型,同时一直存在着差异性。现在的观察角度是通过这个语言符号系统,来初步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秩序的特性。

一般而言,中国社会文化秩序与自然的关系比西方来得更为密切。中国人基本上并不是以技术的态度来面对自然,因此传统上并没有改造自然的习惯。相反,中国人不论在艺术、宗教、社会还是文化上都与自然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在这里,最深刻的道理表现在社会秩序就是宇宙秩序或自然秩序上面,虽然在现代化的历程上,这个联系已经松解甚至瓦解。而表现这个东、西方根本差异的关键,一开始就是语言或文字符号系统,到今天为止,它与自然的联系是世界上仅存而唯一的。文字包含现象,并且表

① 龚鹏程曾在其著作中论述中国文学的发展、文人阶层的形成、文学与诸艺术之关系,探究中国文字之特性及其在哲学、宗教、史学、文学各方面的文化表现,并观察中国这种文字化的社会特质,以及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问题。详见龚鹏程:《文化符号学》,台北:学生书局,2000年。

达现象。^①这个道理在中国表现得最清楚,中国图像式和隐喻式的思想逻辑在此孕育而生,而这个思想逻辑也可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当中看到。^②

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特性,在很多层面上都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思想家早在17世纪就对此颇为好奇,因为它可能表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在1617~1687年间,哲学家莱布尼兹理解中国文字符号系统不只是一种语言学上的工作,更根本的是哲学工作以及初步的社会文化理解工作。中国文字系统本质上与物(Ding, thing)联系在一起,它所体现的就是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经验系统。在这个理解的前提下,1672年提出所谓四个莱布尼兹提问(Leibniz-Fragen),它们从符号系统来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秩序提出理解的方向:^③

1. 中国文字符号的根源是什么?中国文字符号系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结果,还是理性上的一次发明?

2. 中国文化符号如何架构起来?符号以及符号之间是任意地还是有计划性地关联起来?

3. 中国文字系统所指涉的是什么?它的意义关系是中国的自然语言,还是一个普遍的概念语言?

4. 符号和语句的建构遵循什么语法规则?存不存在一个符号和语句构成的关键原理?

对于莱布尼兹而言,中国文字符号系统是一个普遍的概念语言,并且是理性上的发明。它的系统化其实表现中国社会所认为的宇宙和自然秩序,而之所以可能,就是它的符号本身就是来自自然的。在当代哲学家德里达看来,西方连接拼音文字的语音主义,本质上是一个种族中心主义。相反,文字是单纯的痕迹,一切真相的起源,就如同中国古代甲骨文中的痕迹一样。^④由

① D. Palumbo-Liu, "Schrift und kultureller Potential in China", in *Schrift*, hrsg. Von K. L. Pfeiffer,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1993, p. 161~167.

② Hsin-Hwa LIN, *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96, p. 27~32.

③ G. W. Leibniz, *Sämtliche Schrift und Briefe*, Hrsg. V. d.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armstadt 1923; Leipzig 1938; Berlin 1950, B. 1, 2, p. 168.

④ J. Derrida, *Grammatologie*, übersetzt von Hans-Jörg Rheinberger und Hans Zischl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4, p. 109~120.

此,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家是在不同的抽象立场上,表达中国语言和文字符号系统的特殊性。这个符号系统的特性在发展历程上,同时借由社会、经济与科技的不同力量而不断扩散。^①

因此,中国语言和文字符号系统的特殊性是值得研究的,这不只是语言学上的理解,更是社会学和文化理论上的工作。但鉴于这个工作的复杂性,本书并不从人类学的角度去搜集资料,因此也无法在这些资料基础上做详细的分析和说明;作为一项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特性的预备工作,本书在有限的篇幅内,立足于符号系统的理论工作,希望通过西方对于符号系统的理解,尝试观察中国符号系统的特性,并由此延伸东、西方在社会与文化领域中的差异。哲学家胡塞尔的理解,对于中国人通过语言文字抓取自然对象的特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他的“意向”(Intention)概念中,传统中国语言、艺术与文化等符号系统所运转的是意识与自然对象的同时呈现。胡塞尔在这早期理论的发展,“意向”概念与“符号”(Zeichen)概念乃同时地在成长当中。而“意向”概念的发展,事实上也使他的符号理论从符号学的领域转向现象学的领域。在《逻辑研究》一书之后,在作为意向性之根本的意向经历中,意向乃与它的意向对象一起被给予。也就是在意向经历拥有它的意向对象之情况下,意向经历拥有它的对象性意义(sein gegenständlicher Sinn)。在此,拥有意义(Sinn zu haben)乃是所有意识的基本特征,而这当然并不只是一般的经历,而是能拥有意义以及纯理智的经历(sinnhabendes noetisches Erlebnis)。对于这个“意向”概念进一步发展来说,其最重要的关键步骤乃是对在现象学的纯粹性中真实存在者的绝对真实的描述。^② 在此,符号乃是作为被知觉的经验内容或规定(Bestimmung)的承载者(Träger),而在经历的对象性意义中,这承载者乃拥有其真正的意义。^③ 在此,沟通含有一个关于意义的传送(Sinnübertragung),而符号也含有一个关于传送的媒介

① J. Goody, *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40~41.

② E. Husserl,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Gesammelte Schriften 5,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92, p. 207.

③ E. Husserl,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Gesammelte Schriften 5,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92, p. 83~90.

(Übertragungsmedium)。^① 而语言正是这被人们在沟通中所习惯使用的符号系统,语言因此也是所谓精神世界的对象性之客观性(Objektivität der Gegenständlichkeit der geistigen Welt),而不是单纯物理世界的客观性。^②

中国符号与文化系统所体现的自然对象不是一个单纯的物理世界,而是一个精神世界的活动,只不过是大自然当中进行并且与它的规律有所共振。当然,这个精神活动不会只停留在这个简单的对象性上,而是在社会发展的历程上,符号与文化逐渐形成沟通的系统。胡塞尔理论发展至《逻辑研究》中,“符号”概念一直扮演着重要并且独立的角色。然而,在取向关怀上,它并没有将符号类型的符号学区分进一步扩展为语言文法区分。^③ 胡塞尔这个区分的贡献,首先并不是在语言哲学或语言科学的目的上,而是在于结合逻辑与知识理论的问题上,而这问题直接与语言哲学的目的有连接之处。^④ 在此,语言符号的使用对于沟通来说虽然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作为意义给予的本真思维来说,则只是次要的中介。承接胡塞尔,舒兹整合韦伯的理论,主张行动乃是主观意识的成就,并且是社会世界之建构的前提。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则在不同的面向上,给予舒兹更富于经验的理论补充。站在“理解”(Verstehen)概念的传统上,语言相对地更能显示出它对社会世界的现实性的重要,甚至是主要性。在米德的理论中,语言则只是在社会行动中所力图解释的一个现象。对于前者,“行动以及合乎意义的概念属于一个语言的语义和语句的基本范畴”。^⑤

① B. Waldenfels, “Der Sinn zwischen den Zeichen”, in *Studien zur Sprachphänomenologie*, Beitr. von E. W. Orth, Freiburg/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GmbH, 1979, p. 150.

② E. Husserl, *Formale und transzendente Logik*, Gesammelte Schriften 7,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92, p. 24.

③ J. Habermas,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Zwölf Vorlesung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5, *Vorlesung VII*. 而另外一位与哈贝马斯有不同理论取向的哲学理论家卢曼,在处理意义与符号的主题时,也认为我们必须像胡塞尔一样,认真区分指示结构(Verweisungsstruktur)与符号结构(Zeichensstruktur),即本书中所言的标志(Anzeichen)与表达(Ausdruck)。N. Luhmann, *Soziale System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8, p. 107.

④ E. W. Orth, “Das Phänomen der Sprache und die Sprachlichkeit des Phänomens”, in *Studien zur Sprach-phänomenologie*, Beitr. von E. W. Orth, Freiburg/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GmbH, 1979. 胡塞尔这个关于符号的理论对于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而言,乃是一个重要的准备工作。p. 15.

⑤ A. Schütz und T. Luckmann, *Strukturen der Lebenswelt*, Bd. 2,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4, p. 15.

中国社会与文化秩序的发展,就是在上述体现自然的符号系统当中进行的,它是一种自然的语言(natürliche Sprache)。中国人在这样的符号系统中诞生,在此之中成长与社会化。人们的心理结构、内心的文化韵律以及社会的整体结构都是在这种自然语言中成形,例如书法、绘画、舞蹈、音乐以及宗教等活动都与西方文明有着不一样的形态。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关系(Wir-Beziehung)之沟通过程中,行动规则的相互主体性不只预设了相互主体间的符号(Zeichen)组成,也预设了一个在社会或历史中已经存在的符号系统(Zeichensystem),也就是一个自然的语言。同时语言构成的基本条件则又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互相反应,以及相互主体性中的行动。对于舒兹与卢克曼,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可以下列几点予以说明:^①

1. 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语言的组成条件为:语音经历的客观性、语音模型的指示一致性,以及语音模型在行动中表达的一致性。具备这些条件,原型符号(prototypische Zeichen)的构成才因此产生。也就是在原型符号转变成具有概念意义的符号之前,它们必须满足相互主体性中的一些确实条件。并且在语言形式上,我们在心意交流的过程上有着相互间的社会控制形式,以及对于客观事件的主观控制。同时两种不同的控制形式也都要求语言形式(Sprachformen)的产生与意义。通过这个要求,行动者可以超越只局限在我们之间的关系,进而指向社会行动的计划与合作。因此,对于所有指涉长期时间或高度复杂事件的社会行动而言,语言也是一个准理想系统(quasi-ideales System)。

2. 语言基于本身的相互主体性构成,也必须拥有存在于社会中的结构(Struktur)。也就是,人诞生在一个历史的生活世界之中。在其中,语言有其具体的、已存在的以及已决定的结构。语言结构将直接由过去相互理解的行动所确定,并且间接由组成行动空间的社会结构所确定。在人类的行动与其指向世界的过程中,这些语言结构可以被视为制度性(institutionell)的确立。总之,语言具有极富表现力的结构,它是在相互主体性中建立,历史地累积起来,并且社会性地传送开来。

^① A. Schütz und T. Luckmann, *Strukturen der Lebenswelt*, Bd. 2,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4, p. 201~202.

3. 社会结构对语言也有决定作用。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结构控制着一个特殊沟通过程的锁链。而后者决定一个特定的语言结构与语言层级。通入语言之门的机会是由社会所分配的。这也表现知识的社会分配,它一直以来均标示着社会不平等。

4. 达成相互理解的方式,并不能由语言系统、习惯规则或社会结构彻底决定。在不同的历史与社会中,总是存在着表达自由的程度差异。适应于这些不同自由程度,达成相互理解的中介也就依不同的状况实现了沟通的功能。

符号系统在生活世界中早已有其确定的结构并与社会结构产生互动的影响。通过语言,人们不但意识到与世界分离开来;在社会世界的分析中,人们通过语言更行动于不同的意义世界(Sinnwelten)中,并且达成社会计划与合作的可能性。这样的语言思想在现今的社会学理论中,可以由两个相反方向来加以讨论与扩充。首先,在相互主体间提高语言意识的批判力量,也就成为哈贝马斯沟通理论的语言思想。但是,批判力量的假设(Unterstellung)总是给予日常生活的语言过多的负担。其次,将语言现象放置在一个无主体与无意识的区分(Differenz)运作中,也就是卢曼系统理论的语言思想。然而编码化的语言也将相互主体间的情感与理解、语言的想象以及生活世界中多元的意义世界淡化到最高的程度。

重要的是,中国语言符号系统不是字典或者博物馆的东西,也不是单纯被理解的系统,而是正在日常生活当中被使用着。通过它,中国人相互理解并且建立制度和文化,更与自然在不同形态当中进行对话。中国社会文化秩序与符号系统的关系不是静态的,而是在符号系统的使用当中进行秩序的建构或重建。对于哈贝马斯而言,“沟通的行动模式预设语言,并且对于不可简约的相互理解来说,语言是作为必要的中介(Sprache als ein Medium unverkürzter Verständigung)。在这语言的中介中,言谈者与倾听者双双从他们素朴的生活世界中的视域,关联于一些客观、社会与主观世界中的东西,以便能共同地去定义它们的情境”。^① 也就是言语行动的表达早已隐含了关于以上三个不同的世界,以及已被提出的有效性要求。亦即谁做了陈

① A. Schütz und T. Luckmann, *Strukturen der Lebenswelt*, Bd. 2,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4, p. 142.

述,它就连接真理(Wahrheit)的要求;谁完成表现的言语行动,他也连接真诚(Wahrhaftigkeit)的要求;谁讨论到主题在规范上的正确与否,他也就涉及正确性(Richtigkeit)的要求。当然在每个言语行动当中,三个有效性要求是同时被提出的,只不过其中一个在某些时候比较主要而已。从理性(Rationalität)概念的提出,经过相互理解(Verständigung)概念到这样的普遍语用学(Universalpragmatik),哈贝马斯同时整合了多种语言思想。^①这也是他将韦伯的合乎目的之理性概念,在现代性中扩充到沟通理性所必经的道路。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程上,中国大陆的语言符号系统一方面是在沟通上的媒介,如同于其他社会一样,但一方面它的简体化也使得过去与自然相互共振的场域逐渐消失。特别是在今天的信息社会中,大家已经习惯的计算机文书使得符号系统的使用更是失去它的整体性以及和自然的联系,因为真正书写的是计算机上的键盘按钮。这反映的是一个逐渐远离自然的历程,或者说符号系统本身与其他系统或者自然对象已经没有任何的联系。这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是一个相当重大的改变,而且比西方国家还来得重大,因为中国的文明起源就是建立在与自然的联系上。对于这个道理,社会学家卢曼有精辟的说明,意义的语言性(Sprachlichkeit von Sinn)对于他而言意味着限制和危险。相对于哈贝马斯,从语言本身出发,并没有任何“真理的产生”或“倾向于真理”可言。语言并不只是沟通的中介,因为在系统中,没有沟通也看得到语言的运作。他也给予语言一个不同于日常自然语言(natürliche Sprache)的内容。“语言真正的功能,在于借助象征符号(Symbolen)的意义一般化(Generalisierung von Sinn)。”^②在所有意义的经验中存在着分别(Differenz),也就是实际的给予者(Gegebenem)与基于此给予者的可能性之间的分别。所有意义的经历中,这个不断地产生的基本分别,给予所有经历一个信息的意义。“产生意义的过程,就是不断在实在性(Aktualität)与可能性(Möglichkeit)间产生分别。意义是可能性所正在进行的实在化。”^③在这些可能的结构中选择,人们正在世界中学习,将自己作为系统(System)来安排。

① 例如语言的器官模式,真理功能的语义学与言语行动的理论。A. Schütz und T. Luckmann, *Strukturen der Lebenswelt*, Bd. 2,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4, p. 372~452.

② N. Luhmann, *Soziale System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8, p. 137.

③ N. Luhmann, *Soziale System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8, p. 100.